

目 录

(一)什么人贊揚赫魯曉夫	2
(二)屈服于核訛詐的投降主义	6
(三)和平共处政策被篡改成为追随美国的政策.....	16
(四)对“和平的”帝国主义的幻想	24
(五)彻底清算赫魯曉夫路线	30

自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决定以来，已經有一个月了。虽然苏共新领导还没有公布解除赫鲁曉夫职务的真相，但是，无法掩盖的事实是：赫魯曉夫并不是因为“年迈和健康情况恶化”被解除职务的，而是在赫魯曉夫的领导下，苏共的国内外政策面临了严重的破产局面而被迫下台的。在迫使苏共领导决心采取“非常手段”解除赫魯曉夫职务的政治背景中，赫魯曉夫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失敗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赫魯曉夫路线問題，决不仅仅是苏联共产党的問題。赫魯曉夫及其追随者們把无原則地向帝国主义势力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让步和投降的路线叫作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路线，企图把它强加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和平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从而不仅造成并越来越扩大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团结，而且給全世界整个反帝和平力量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赫魯曉夫的所謂“和平共处”路线，在反党修正主义者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支持下，給我国的和平民主运动带来了有害的影响，阻碍了它的正确的統一与发展。赫魯曉夫的責任是极其重大的。

正因为如此，在赫魯曉夫下台的时候，重新批判地总结赫魯曉夫在外交政策方面所执行的路线，說明不但把苏联政府和党引导到今天这样困难的处境、而且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混乱和带

来有害影响的根源所在，这也是日本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极为重要的任务。因为，为了从我国和平民主运动中清除赫魯曉夫的所謂“和平共处”路綫所带来的有害的机会主义影响，为了不使赫魯曉夫下台这件事仅仅成为馬克思列宁主义同現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过程中一时的插曲，而使它成为克服現代修正主义和恢复謂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的积极因素，这样做都是必要的。

（一）什么人贊揚赫魯曉夫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自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赫魯曉夫就竭力歪曲和平共处政策，并企图把它强加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后，他总是給对他所主张的“和平共处”政策采取批判态度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扣上反对和平共处、希望打热核战争的“好战主义者”的帽子，并认为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意見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是选择和平共处道路，还是选择热核战争道路之間的对立。

他說：“某些教条主义者滑到了托派分子的立場上去，并企图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向发动世界战争的道路。”他們“企图把历史推向引起战争的方向，企图通过战争的手段，通过牺牲千百万人的道路去解决共产主义和資本主义誰战胜誰的問題。”（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赫魯曉夫在苏联最高苏維埃會議上的報告）

众所周知，在赫魯曉夫担任第一書記期間，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給我們党中央的信中，甚至誣蔑地指責我們党“放弃了以实现和平共处政策为目的而进行的斗争”，

“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間进行战争，进行新的世界大战，也就是热核战争”。但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存在着拒绝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間的和平共处、提倡打世界大战的党和一派势力的说法，是赫魯曉夫及其追随者的无耻捏造。

八十一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所通过的莫斯科声明在全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致支持下指出，必須把维护和平共处、防止战争的斗争规定为全世界共产党人的重要任务，为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一切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按照具体体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万隆会议通过的和平十项原则中的和平共处原则建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間的关系而斗争。莫斯科声明的这个原则性观点，同时也是我們党一贯的观点。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日本共产党纲领，将我們党为保卫世界和平、争取各个国家間的和平共处而斗争的基本立場明确规定如下：

“党要为争取实现世界和平以及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而斗争。党要要求禁止核武器，并且要为普遍裁軍而斗争。党要为使日本同一切国家的邦交正常化，为发展經濟和文化交流，为扩大日本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間的友好亲善关系而斗争。党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我国卖国反动势力勾結起来准备对社会主义各国和亚非各民族进行侵略战争，反对一切准备原子战争的活动。”

中央委员会提交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草案》把纲领的这一观点进一步具体化了。《报告草案》把“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争取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的任务”作为我們党当前的六项斗争任务之一，并且提出了如下的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的具体内容和方針：第一，“必須进一步全力以赴地进行斗争，反对以垄断资本为核心的美国反动势力所推行的依附美国的、反共的、侵略的

外交政策，粉碎‘日韓會談’，爭取恢復日中邦交，締結日蘇和約等等”。第二，“必須同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力量團結起來，加紧展開斗争，要求全面禁止核武器和核試驗，締結普遍裁軍協定，反對以美帝国主義為首的世界反動勢力在世界各地進行的一切侵略戰爭和备战活動。”

把實現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的和平共處規定為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基礎之一和為爭取世界和平而斗争的重要目標之一的莫斯科聲明以及貫穿在我黨綱領中的同一觀點，今天仍然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全世界共產黨人和我們黨的工作的共同指針。只要不是存心粗暴地歪曲事實、進行毫無根據的誹謗，就不能把為反對現代修正主義而斗争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譴為和平共處政策的“敵對者”。

但是，所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所一致確認的這個和平共處問題，現在在國際爭論中已經成為最尖銳的、最有分歧的、最大的問題之一，這也是事實。但是，這決不是象赫魯曉夫及其追隨者所說的那樣，是因為出現了拒絕和平共處、提倡打世界大戰的“好戰的”黨和一派勢力。相反地，這場爭論的引起是由於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領導在和平共處問題上根本背離了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所規定的原則立場，墮落到放棄同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進行斗争、而向帝國主義投降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上。這就是說，今天圍繞和平共處問題的爭論，並不是贊成和平共處還是反對和平共處的爭論，而是是否正確地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和平共處政策的爭論。

列寧曾經“提醒”普列漢諾夫說：“請你告訴我，贊揚你的是誰，那我就能告訴你，你的錯誤在什么地方。”（《列寧全集》第七卷中文版第368頁）這個“提醒”完全適用於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路線，

赫魯曉夫被解除职务的消息发表后，受到最大震动的不仅有现代修正主义国际潮流，同时还有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反动势力。他们异口同声地强调赫魯曉夫的“和平共处”路线的高明，一致表示“期望”苏共新领导也务必坚持这一“和平共处”路线。

例如，美国总统約翰逊在十月十八日向全国发表的特别广播演说中，大肆赞扬赫魯曉夫在“古巴危机”以后，对过去的“错误”进行了反省，走上了同美国合作的道路，并强烈地号召苏联的新政府继续沿着赫魯曉夫的路线前进。他说：

“赫魯曉夫曾经犯了进行危险的冒险的过错。美国曾需要采取非常坚定和理智的态度（首先在柏林、后来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以便在不进行战争的情况下击退他的威胁和行动。然而，他从错误中汲取了教训，他对现实不是盲目的。在过去两年中，他的政府认识到在核时代需要头脑清醒。他参加了禁止核试验条约。他参加了有助于防止由于意外情况而发生战争的热线。他同意不在宇宙空间设置核武器。在这些行动中，他表现出了理智和头脑清醒的判断力。……

“现在，苏联有两个人分担着最高责任。……我们可以希望他们将同我们共同抱有我们的伟大目标：防止核战争。”（十月十九日《东京新闻》晚刊）

在我国，赫魯曉夫的“和平共处”路线，早就得到站在彻底反共立场上一直支持美国世界政策的民主社会党右翼领导人的共鸣。民主社会党的西尾委员长发表了“欢迎赫魯曉夫的现实政治路线”（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在神户的谈话）等赞颂之词。赫魯曉夫被解除职务的消息一公布，资产阶级报纸都一致发表社论，赞扬赫魯曉夫，希望新政府继承赫魯曉夫的“和平共处”路线，自由民主党经济界的领导人也几乎异口同声地发表了同样内容的谈话。

“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提出了以美苏解冻为中心的和平路线，在国内問題上也一个接着一个地解决了悬案，等等。”（富士銀行總經理岩佐凱实）“赫魯曉夫推行了和平共处路线，他似乎是一个可爱的人。”（經濟团体联合会会长石坂泰三）“因为赫魯曉夫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对他被解除职务）我感到遗憾。”（經濟团体联合会副会长植村甲午郎）“我們期望苏联新政府更加强有力地推行和平共处政策。”（自由民主党干事长三木武夫。以上均見十月十六日《日本經濟新聞》晚刊）

赫魯曉夫完全歪曲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甚至加以阉割，使它变质成为約翰逊等美帝国主义的代表以及以自由民主党和垄断資本为中心的日本臭名远揚的反动势力高举双手表示欢迎的东西。

（二）屈服于核訛詐的投降主义

赫魯曉夫的“和平共处”路线在哪些問題上背离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立場呢？現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他的主要論点。

第一个問題，赫魯曉夫主张，在出現了可能毁灭人类的核导弹武器的今天，维护和平共处已經成了人类的压倒其他一切任务的“首要任务”，他以核战争的威胁为借口企图使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投降主义路綫合法化，而且还进一步要求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也服从于“和平共处”的任务。

赫魯曉夫在一九六二年秋天发生的所謂“古巴危机”之后不久所作的两次演說——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在苏联最高苏維埃會議上的报告和一九六三年一月在德国統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

致詞——中，以极其系統的形式发展了他的上述观点。赫魯曉夫在两次演說中首先就热核战争的危險問題談到：

(1)今天的世界“好象是生活在一个装滿热核武器的火药庫上”，帝国主义者在世界上各个地区所制造的“侵略的火种”中都“潜藏着可以燃起普遍的火箭一核战争的火星”。(在苏联最高苏維埃會議上的報告)

(2)世界核战争一旦爆发，那就不仅会使资本主义体系灭亡，而且整个人类也要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而丧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建設的前提。“不能設想在世界文化中心的废墟上、在荒无人迹的和布滿热核尘埃的土地上，建立共产主义的文明。”(在德国統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肯尼迪曾經把在热核战争将会造成的毁灭危险之下惶惶不可終日的人們的生活，比作“在达莫克利茲的核劍之下生活”，并且說这把核劍“是用极細的綫系着的，而这条綫，說不定在什么时候，也許由于偶然、由于計算錯誤或者由于瘋狂而被割斷”。(一九六一年九月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說) 赫魯曉夫几乎原封不动地重复了肯尼迪的这种論調，把今天的世界比作是說不定什么时候会爆发的“装滿热核武器的火药庫上的生活”。

乍看起来，似乎非常认真地考虑了核战争危险的这个所謂“核战争毁灭人类論”，实际上不仅违背了莫斯科声明所規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場，而且也违反了赫魯曉夫自己过去的主張，可以说这是赫魯曉夫的投降主义的出发点；这种論調如实地表明了赫魯曉夫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核說詐政策的俘虜。

不言而喻，在已經出現了具有极大破坏力的热核武器的今天，即使帝国主义者所准备的世界战争是一种結果将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帝国主义的自杀行为，但是也将給社会主义各

國造成巨大的破坏性的后果，會給人类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因此，防止世界战争，爭取世界和平和不同社会制度各国的和平共处的斗争，已經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任务。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沒有一人否认这一点。

然而，如果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根据热核战争可能造成的“毁灭人类”的危险这一点，得出这样的結論說：在今天**不管付出任何牺牲**也要防止全面热核战争，才是“头等”重要的；在热核战争的“毁灭人类”的危险面前，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已經失去意义，而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早已变得只具有次要意义。那末，这种結論必然导致这样的結果：在以毁灭人类相威胁的帝国主义的核訛詐政策面前屈膝下跪，而走上无止境地让步的投降主义道路。这正是帝国主义者梦寐以求的目的。显而易見，在核訛詐面前吓得胆战心惊的投降主义，不但无助于防止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的危险，恰恰相反，它越来越助长帝国主义核訛詐政策的气焰，使帝国主义得以順利推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从而造成增加核战争的实际危险的結果。

莫斯科声明一方面強調指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勢力当前正在准备的热核战争，对全人类說来，是将給亿万人帶來毁灭和破坏的严重危险，并且号召全世界人民展开阻止核战争的斗争。另一方面又严正地警告帝国主义者：如果帝国主义勢力胆敢发动热核战争，被毁灭的将是帝国主义和資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明确地表示了决不向帝国主义的核訛詐低头的坚决态度，“如果帝国主义狂人发动战争，世界人民将清除和埋葬資本主义”。

这才是唯一的具有原則意义的观点。反帝和平力量只有坚持这种战斗的态度，才能够挫敗帝国主义的核訛詐政策，从而創造出展开在实际上能够防止核战争的斗争的前提。与此相反，如果反

帝和平力量对核讹诈有絲毫的屈服而放弃这种战斗的态度，那末就不能完成防止核战争的任务。要防止核战争，决不能害怕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必须依靠全世界人民的斗争来粉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

过去，赫鲁晓夫也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坚持过这种观点。他曾指出，如果帝国主义者发动新的世界战争，那末这場战争“只会給資本主义帶來崩潰”，社会主义即使将遭到巨大破坏，但仍将继续存在，而且将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胜利。他說：

“我們說，新世界大战的結局只会使資本主义崩潰，这完全不是說，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的战争中不会遭到损失。只要使用現代的毁灭武器，損失当然会是巨大的。然而我們深信，社会主义将继续存在，而資本主义却不能保持。因为，尽管损失巨大，人类不仅会仍然存在，并且将继续发展。……战争一旦爆发，人民就要一劳永逸結束产生战争的社会制度，在本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同〈紐約时报〉記者賴斯頓的談話》）

放弃了自己曾经主张过的这种观点而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屈膝投降的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綫，变成一条企图通过回避同帝国主义核战争政策进行斗争，一味向帝国主义让步来“维护和平”的投降主义路綫，乃是必然的。

赫鲁晓夫从他的“核战争毁灭人类”的論調所得出的第一个实践上的結論是，核战争时代的“和平共处”不能通过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人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核战争政策的积极斗争来实现，而主要應該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基于对热核战争将毁灭人类的危险的共同認識而进行“明智的”协商和“互相让步”来实现。赫鲁晓夫极力攻击主张應該坚持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以保卫和平这种根本立場的人是帮助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勢力、“企图把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向发动世界战争的道路”的托派分子的冒险主义。

他說：“我們共产党人，具有先进思想和信念的人，不应当犯冒险主义，从而使对自己制度的胜利丧失信心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有机会发动世界战争。”（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然而，正如赫魯曉夫在面临着美帝国主义进攻古巴的危险时的行动所表明的那样，以使美国統治阶级“进一步实际地感到热核战争的危险”（在最高苏維埃會議上的报告）为唯一目的，而把核导弹运进古巴，从而陷入了社会主义国家不应有的冒险主义的，不是别人，正是赫魯曉夫。然而，不依靠人民的反帝和爭取和平与独立的力量，而企图用核导弹恐吓帝国主义者的冒险主义，当美帝国主义摆出一副即使引起同苏联进行核战争亦在所不惜的姿态、而以企图强行进攻古巴的核訛詐政策进行反击时，就立刻变成十足的投降主义。借口什么“理智的胜利”，什么“互相让步”，而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要求。甚至一直退却到不同古巴政府进行必要的事前协商，就在美苏之間决定了要进行侵犯古巴主权的“国际视察”。赫魯曉夫所說的“互相让步”，实际上只是单方面的让步。

赫魯曉夫所得出的第二个实践上的結論是，在核战争时代，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也是不可分割地同防止核战争的任务联系在一起的，并借口只有避免核战争才是当代的絕對要求。結果使这些斗争从属于他的“和平共处”政策，主张通过在和平共处环境下进行和平經濟竞赛来确保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而把这当作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基本方針。

赫魯曉夫曾說：

“我們时代的情况是，爭取和平的斗争已經成为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极其重要的条件。現在，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

运动的任何一个問題都不能不同爭取和平和爭取防止世界热核战争的斗争联系起来看。从最近加勒比海地区事件中所得出的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策略的最重要的教訓正是如此。

“現在，由于战争性质的改变和世界舞台力量的新对比有利于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和平共处政策具有更为重大的目标和任务，并在实质上补充着新內容。和平共处政策的最終目的，是为了在和平經濟竞赛中为社会主义战胜資本主义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
(在德国統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赫魯曉夫企图强加給社会主义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样的方針，是在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的借口下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篡改得似是而非的机会主义方針。

第一、在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則，并不是以帝国主义放弃它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从本质上轉变为和平爱好者为前提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即以破坏社会主义和压迫其他民族为目的的侵略倾向是由帝国主义的本性所决定的，如果想从根本上把它消灭，那就必須消灭帝国主义本身。为了在实际上制止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必須針對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进行真正强有力的反帝斗争。因此，在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所謂和平共处，只有依靠社会主义各国和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展开斗争，縛住它的侵略魔爪，才能实现。而且在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所謂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和平的帝国主义”与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友好相处的、取消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新的世界秩序。即使在依靠全世界人民反帝和平斗争的发展，迫使帝国主义者接受和平共处的方向这个問題上取得一定的成功以后，如果不繼續对醉心于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无时不在企图破坏和平共处关系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

行不断的斗争并予以粉碎的話，也不能維持和平共处的局面。通过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进行斗争来实现和确保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間的和平共处，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的核心。

而赫魯曉夫却以提出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的办法閹割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平共处政策的这个革命核心，而把它篡改为对帝国主义进行妥协和投降的方針。但是，无论怎样强调核武器的破坏力量，也不能使赫魯曉夫的投降主义合理化。

既然用核战争的危险来威胁世界和人类的罪魁禍首是为了实现統治世界的野心而热中于核备战、实行核詭詐政策的帝国主义，那末显然，防止核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实现和平共处的任务，只有以如下的一点为基本方針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通过全面发展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斗争，并結成反帝和平力量的国际統一战綫来粉碎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为了維护世界和平，必須建立保卫和平、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所鼓吹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政策的最广泛的統一战綫。”（《莫斯科声明》）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同的談判或“互相让步”，也只有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国际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保卫和平运动等全世界的和平与民主力量的斗争挫敗和粉碎帝国主义的战争計劃的过程中，同全世界人民的这一反帝和平斗争的发展正确地结合起来，才能够对和平共处和保卫和平的事业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才能够迫使帝国主义者簽訂这样或那样足以在实际上限制它的侵略政策，并且有效地打击它的战争計劃的协定。

赫魯曉夫的路綫抛弃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并且污蔑这个观点是刺激帝国主义者，企图挑起核战争的“冒险主义”。他在这种借口下，压制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一味地企图通过同帝国主义国家以对“热核战争的危险”的共

同認識为基础的“明智”的談判来确保和平共处。这是一条不折不扣地全面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核訛詐政策的、要求全世界人民向帝国主义让步和屈服的路綫。这条路綫不但不是真正爭取实现和平共处的道路，恰恰相反，它只能巩固帝国主义的立場，促使帝国主义加紧推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

而且，根据这种投降主义路綫，即使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緩和紧张局势”，但是这种“緩和”既然不是通过实际上打击并粉碎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而贏得的，而是在向帝国主义妥协和追随帝国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末，就决不能把它看作是向和平共处方向真正地迈进了一步。不仅如此，这种“緩和”反而会在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实际上仍然继续威胁着真正的和平的时候，散布一种似乎“和平共处”已經实现的危险的幻想，从而削弱世界人民的反帝和平斗争，起着帮助帝国主义玩弄欺騙性的“两手政策”的作用。

第二、在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和平共处政策既不能代替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也不能在世界人民的斗争中优先于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而占据“首要”地位。莫斯科声明指出：“我們的时代，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声明明确地把下述革命观点归納成一个公式，即社会主义阵营、資本主义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各被压迫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等当代的一切革命力量汇合成了一股洪流，正在冲击和摧毁着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这才是当代的根本問題。今天，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及其条件，从根本上来看，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和欧洲一系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所創造出来的

这种可能性及其条件所表明的那样，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和世界和平的前景，从全局来看，是由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各国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这三种主要力量所形成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力量同帝国主义的战争势力之間的力量对比来决定的。

但是，赫魯曉夫在和平共处和革命运动的关系問題上，也完全背离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所当然的原则立場，仍然以避免核战争是当代至高无上的任务为借口，企图使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从属于他的“和平共处”政策，主张社会主义通过和平的經濟竞赛战胜资本主义乃是当代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根本性的前提。这是一种維持現状的立場，事实上把社会主义革命抛到九霄云外，同时，把民族解放斗争控制在帝国主义所容許的范围以内，而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观点背道而驰，結果仅仅把通过无原則地追随美国来保持“美苏”間的緩和当作当代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任务。

不言而喻，这种大談特談为了“和平”的利益必須牺牲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的論調，是同把当代看作是帝国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时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观点根本对立的机会主义的論調。但是，赫魯曉夫的这条“和平共处”路羅的消极作用并不止于此。

即使只从赫魯曉夫事实上当作唯一至高无上的任务的和平共处这个問題来看，通过这种維持現状的政策，也不可能使帝国主义者接受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間的和平共处，更不可能在将来确实实现和巩固世界和平。

不言而喻，以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为转折点的世界力量对比上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在現在已經产生出了这样的現實可能性，即，通过全世界的反帝和平力量所进行的斗争可以事先防止帝国主义者推行世界战争計劃和实现各国同的和平共处。但是，

美国帝国主义并没有放弃核战争政策，发动世界战争的实际危险依然存在。从最近印度支那的局势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决不能容许过低估计世界战争的危险。任何人恐怕也不能否认在防止这种危险、确保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起着极其巨大的作用。正是这些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面对面地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在这种政策的重要据点上直接地打击着这种政策。因此，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加强同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团结，是争取世界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的基本内容之一。而在“和平共处”的幌子下，压制民族解放运动或者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采取消极态度的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违背了争取世界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的真正利益，在实际上增加了世界战争的危险。因为，假如没有民族解放战争、没有革命运动，全世界的人民运动仅仅变成赫鲁晓夫之流的“和平共处”运动的话，那时，不仅将不可挽回地削弱制止帝国主义者的战争政策的力量，而且将为帝国主义者能够更加容易地继续它的侵略活动提供保证。

而且，在今天的争取世界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中，不仅提出了防止世界战争的任务，同时还提出了消除世界战争的危险、进一步巩固地实现和确保和平共处的任务。但是，如果实行赫鲁晓夫之流的维持现状的政策，那末，甚至接近这一任务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要完成这一任务，恰恰就必须变革现状，不仅必须依靠加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力量，而且必须通过帝国主义国家内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革命运动的胜利以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驱逐帝国主义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力量之间的力量对比，使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贏

得絕對优势。

莫斯科声明关于和平問題的闡述也貫穿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种变革現實的观点，而在解放斗争的胜利的前途中給世界人民爭取和平斗争的远景以应有的地位：(1)在目前的力量对比情況下，如果全世界的反帝和平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就“能够防止世界战争”；(2)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同資本主义各国和殖民地、附屬国革命运动的新的胜利結合起来，“社会主义和和平的力量”“占絕對的优势”的时候，才“將會出現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現實可能性”；(3)为了“最終消除产生任何战争的社会原因和民族原因”，保证持久和平，必須爭取“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

这种观点才是关于确立和平共处、关于和平共处与革命的关系的唯一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世界形势的本质决不会因为具有空前破坏力的热核武器的出現而发生变化。

如上所述，赫魯曉夫的“和平共处”路綫，是一条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詐政策面前吓破了胆而陷入双重的投降主义的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綫。如果按照这样的方針来領導全世界的人民，那末，既不可能贏得世界和平、把全世界从热核战争的威胁下真正地解放出来，也不可能在現實生活中开辟出走向和平共处的道路和巩固世界和平。

(三) 和平共处政策被篡改 成为追随美国的政策

第二个問題是，赫魯曉夫把和平共处政策篡改成为“美苏合作”政策，并进而通过把美帝国主义的主要勢力美化成为“和平共

处”力量的办法，特別把和平共处的口号变成了追随美帝国主义的口号。

赫魯曉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把和平共处原則宣布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綫”的时候，已經开始在“和平共处”的幌子下一味地宣揚“美苏合作”路綫。他說：(1)世界形勢，归根到底取决于“在工业方面是世界上最雄厚、在軍事方面是最強盛的大国，同时都拥有原子武器和氫武器以及雄厚的常規軍备”(赫魯曉夫一九五七年五月答《紐約时报》总編輯問)的美苏兩大国的关系；(2)只要确保美苏兩大国間的“信任”，就“能够长久保障持久和巩固的世界和平”。(赫魯曉夫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同《紐約时报》記者賴斯頓的談話》)尤其是，赫魯曉夫在一九五九年訪問美国的时候，竭力向美国的統治阶级兜售这个“美苏合作”計劃。他說：

“只要想一想，如果資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强大的国家苏联相互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尤其是那种我們希望它会发展为友誼的合作关系，那时，国际关系将会成为什么样子。我同意艾森豪威尔先生这样的話，他曾經写道，‘美苏之間有了相互信任以后，国与国之間的任何其他分歧都不能成为对普遍团结和普遍和平的威胁。’我們这方面願意尽一切努力保证美苏之間的相互信任，从而有助于保障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在匹茲堡市举行的宴会上的講話》)

赫魯曉夫甚至还进一步主张，如果苏联同美国联合起来，那末，以它們的强大的武力为后盾，就可以防止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侵略計劃，就能够起到所謂世界人民的“卫士”的作用。他說：

“如果美国和苏联之間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关系，那末未必有誰能使国际局势复杂化，因为他不得不考慮我們两国的立場而放弃

自己的侵略計劃。”（赫魯曉夫一九六一年九月八日在苏联印度友好大会上的讲话）

赫魯曉夫热中于宣传和兜售這項事实上追随美国的“美苏合作”计划，几乎完全放弃了揭露和谴责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活动。而莫斯科声明所指出的那种为和平而斗争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不倦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政策，警觉地注视战争挑拨者的阴谋诡计，唤起世界人民对那些坚持战争方针的人的神圣愤怒”。

显然，赫魯曉夫的“美苏维护和平”计划，赤裸裸地反映出那种只有苏联才是代表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大国、而且要通过大国间的磋商来决定世界形势的大国主义，以及只要确保苏联的安全、那末其他地区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争端也不会影响世界和平大局的苏联中心主义。仅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看出，这种计划已经完全抛弃了社会主义国家应坚持用来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础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而且，赫魯曉夫企图通过与之合作来保障“持久和巩固的和平”的那个对手，正是美帝国主义。这个美帝国主义业已成为西德和日本的军国主义以及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头目，它把英国、法国和西德帝国主义者变成依附于自己的同盟者，把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地区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拉入侵略性的军事集团，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星罗棋布的军事同盟和军事基地，疯狂地准备对社会主义阵营发动核战争，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进行了军事侵略。莫斯科声明明确规定“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帝国主义”，并且反复强调，各个国家间的和平共处首先只有通过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斗争才能够实现。莫斯科声明的这种立场同赫魯曉夫推行的通过同和平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结盟的

办法来“确保世界和平”的这条路綫，是絕對不能并存的。

赫魯曉夫为了使那条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毫无相同之处的追随美国的路綫合法化，把这条路綫同“核战争毁灭全人类論”联系起来，提出了核战争的危险使具有“現實感”的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朝着接受和平共处的方向轉变这样一种“理論”，开始頌揚美帝国主义的头子是“和平共处”力量，并且已經开始宣传只有同帝国主义的头子举行首腦会談才是爭取和平共处的最重要的方法。

也就是说，根据赫魯曉夫的說法：

(1)在苏联拥有即使遭到美国的核攻击也能够立即进行反击、并且对美国本土进行毁灭性的核报复的力量的目前情况下，对于美帝国主义來說，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政策已經成为“当代唯一現實的政策”(一九六〇年六月在全苏共产主义劳动队和突击手竞赛的先进工作者會議上的讲话)。

(2)因此，在美帝国主义的領導集团中，坚决反对緩和国际紧张局势与和平共处、“主张尽快地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发动战争”的，只是那些丧失了理智的“狂人”(“好战派”)。在同一个領導集团中也有这样的人們(“明智派”)，他們“对时局的估計比較冷靜，从当前国际舞台上力量的对比出发，明确意識到，美国如果发动战争，并不能获胜，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因此，願意接受和平共处。(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在苏联最高苏維埃會議上的報告)

(3)世界形势的現實会使那些最顽固的分子清醒起来，結果“明智派”将战胜“好战派”，“并将推选出能理解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必要性的领导人”作为美帝国主义的领导人。(一九六〇年六月在羅馬尼亞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

(4)这些美帝国主义的“明智派”的领导人同社会主义阵营的

“领导人”赫魯曉夫进行“首脑会谈”和直接接触，才是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可靠的道路。

根据这种观点，赫魯曉夫首先把艾森豪威尔看做为和平而操心的美帝国主义的“明智派”的领导人，称赞他是一位“对当前国际局势的估計表現了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明智，表现了勇气和意志”的总统。（一九五九年九月，《在欢迎尼·謝·赫魯曉夫訪美归来的莫斯科劳动者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并且大肆宣传“戴维营精神”，竭力想通过同艾森豪威尔的合作走上“美苏合作”的道路。

由于一九六〇年五月发生的U2型飞机事件，已經使得赫魯曉夫同艾森豪威尔的合作成为不可能了。在这以后，赫魯曉夫就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任总统候选人肯尼迪身上。在一九六一年六月同新总统在維也納举行会谈以后，就立即开始宣扬肯尼迪是一位“理解到两个强大国家政府所担负的重大责任”的总统。（引自关于《維也納会谈的成就》）在經過一九六二年十月发生的所謂“古巴危机”以后，赫魯曉夫越来越加紧颂扬肯尼迪。尤其是，当肯尼迪于一九六三年六月在美利坚大学发表了演說的时候，赫魯曉夫认为这篇演說是根据对国际形势的现实估計談到了“必須寻求道路，使人类擺脫軍备竞赛，擺脫世界热核战争威胁”而大加欢迎，并且反复强调說他在战争与和平的一系列根本問題上同肯尼迪有着“相同的意見”。（引自《加强和平事业，发展合作！》一文）而且，过了一个多月以后，赫魯曉夫就全面地接受美国政府关于禁止核試驗的要求而締結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肆无忌憚地加入了他梦想已久的“美苏合作”体制。

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丧命，对赫魯曉夫來說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赫魯曉夫利用这个事件进一步加紧颂扬肯尼迪是“和平政治家”，并且开始称赞新总统約翰逊是“明智派”的第三个政治代表。

今年四月訪問了匈牙利的赫魯曉夫，在包爾紹德化學聯合工厂發表的演說中，就他贊揚肯尼迪在美利堅大學的演說這件事為自己辯護，並且指出約翰遜、腊斯克和富布賴特等人是肯尼迪的“和平共處”路線的繼承人。他說：

“我曾經由於稱贊肯尼迪的這個講話而受到批評。但是，可不能簡單地對待事物。可不能認為我們都是聰明人，而我們所有的敵人都是傻瓜。可不能閉眼不看力量對比朝着有利于和平與社會主義的方向的變化所引起的現象。

“在這方面還可以援引去年年底美國國務卿腊斯克發表的聲明。我確實認為，美國總統約翰遜也是採取這種立場的。美國參議員富布賴特不久之前也發表了理智的看法。

“所有這一切當然不是出於對社會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好感。這不過是表明了他們的現實感：承認我們的存在，承認我們的發展和擁有極大的威力。”（塔斯社一九六四年四月八日消息）

歸根到底，按照赫魯曉夫的說法，艾森豪威爾、肯尼迪、約翰遜這幾任美國總統及其政府，都是“冷靜地”估計目前的力量對比、一直探求“當代唯一現實的政策”——和平共處的方向的“明智派”的政治代表。

赫魯曉夫把艾森豪威爾、肯尼迪、約翰遜這樣地美化成為“和平共處”力量的唯一實際根據，在於他們這幾年來改變了策略，採取了一定程度的“對蘇和好”政策。不錯，美帝國主義的這些領導人，特別是肯尼迪、約翰遜，為了回答赫魯曉夫的“美蘇合作”的呼喚，改而採取了“對蘇和好”政策，這是一個事實。但是，如果他們真的象赫魯曉夫所說的那樣，正在從推行戰爭政策轉向執行和平共處政策的話，那末，為什麼在這些總統的指揮下，繼續推行和加強了象U2飛機事件、進攻古巴、在印度支那和剛果進行侵略戰爭

这样一些核訛詐政策和对亚非国家的侵略政策呢？赫魯曉夫对这个問題的回答是简单的。按照赫魯曉夫的說法，这是美国統治阶级内部“暗藏的复杂的斗争”的結果，是“明智派”的总统屈服于否定和平共处、始終坚持战争政策的“好战派”的压力的結果，而不是“明智派”本来的立場。（例如赫魯曉夫关于U 2 飞机事件的說明）因此，为了保障世界和平，必須同帝国主义的“明智派”合作，孤立帝国主义的“好战派”。这就是赫魯曉夫編造出来的和平共处的“基本战略”。

但是，赫魯曉夫把美帝国主义的“对苏和好”政策同美帝国主义以亚洲作为一个中心的核訛詐政策与軍事侵略政策看成是本质上互相对立的善恶两个方面，并且断定代表这两个方面的“明智派”和“好战派”正在美帝国主义内部进行着“暗藏的复杂的斗争”。赫魯曉夫的这个假說，是他凭空捏造出来的。而且，只能暴露出他早已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别是关于帝国主义的“两手政策”的基本观点忘得一干二淨了。

肯尼迪和約翰逊等人的“对苏和好”政策，是美帝国主义旨在破坏社会主义体系和扼杀民族解放运动的“世界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同赫魯曉夫把原因完全归之于“好战派”的压力而推行的殘暴的軍事侵略政策和核訛詐政策，在本质上并没有矛盾。肯尼迪和約翰逊政府推行“对苏和好”政策这件事情，只是表明：第一，美帝国主义“現實地”考虑到目前的力量对比，在当前已經改而采取了这样的战略方針：一面避免同拥有最强大的防御力量的苏联发生全面核战争，一面逐一地各个击破中国以及除去苏联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第二，他們最大限度地利用已經产生以赫魯曉夫为核心的現代修正主义潮流这一情况，企图使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内部演变”，并且分裂社会主义

陣營。正如許多軍事評論家所論證的，美國的軍事戰略也以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〇年為轉折點，完成了巨大的轉變，制訂了這樣的战略方針（有限局部核戰略）：（一）把中國、朝鮮、越南等亞洲社會主義國家當作當前的直接攻擊目標；（二）為了防止在亞洲的侵略戰爭擴大成為對蘇全面核戰爭，而把巨大的核攻擊力量集中針對蘇聯，以抑制蘇聯的核報復。下面的事實也充分證明了上述情況：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在採取“對蘇和好”政策的同時，却以推行“遏制中國”政策為中心，變本加厲地推行侵略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策，而且實際上絲毫也沒有放鬆目的在於確保對蘇聯的核優勢的扩充核軍備。

如上所述，這種一方面推行“對蘇和好”政策和另一方面推行核備戰、核威脅和侵略亞洲的政策的做法，歸根結底，乃是美帝國主義以破壞包括蘇聯在內的整個社會主義體系和扼殺民族解放運動為目的的統治世界計劃的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猶如一輛車子的兩個車輪。如果象赫魯曉夫那樣，對這種情況作出錯誤的估計，立即把美國今天推行的“對蘇和好”政策美化為向和平共處政策的根本性轉變，那就不可避免地會變成為美化在“對蘇和好”政策的掩蓋下推行着最殘暴的侵略政策的美帝國主義和它的整個“兩手政策”。

不言而喻，在美帝國主義的統治階級內部，還有以戈德華特為代表的、反對“兩手政策”、贊成推行露骨的戰爭政策的極右派，當然不應當忽視這一派和美國壟斷資本的主要勢力之間的種種矛盾和對立。但是，這決不會因此使赫魯曉夫的“基本戰略”變成正確的戰略。因為，赫魯曉夫的論調是說，這個“好戰派”才是美帝國主義的戰爭勢力和侵略勢力的真正代表者，而否認“明智派”和“好戰派”都是代表帝國主義的利益和政策的勢力（哪一派更加反動，暫

且不談）。不仅如此，它还为肯尼迪、約翰逊以及美国垄断資本的主要勢力塗脂抹粉，好象他們是对“好战派”起着制止作用的爱好和平人士的集團。而实际上，他們正是那些目前正在一面利用“好战派”的主张，一面制訂了并且竭力推行着美帝国主义的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的負責人。这是拚命地帮助美帝国主义戴上“和平”假面具的做法，这一点完全毋需多費唇舌。

不論赫魯曉夫怎样玩弄詭辯，都无法掩盖这样的事實：他的所謂要同（帝国主义）“明智派”实行合作的“基本战略”，在客观上已經变成美化美帝国主义的“世界战略”并从背后給予支持的有力支柱；这个“基本战略”轉移世界人民的視線，使他們看不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从而造成最便于美帝国主义一面欺騙各国人民、一面推行它的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形势。

（四）对“和平的”帝国主义的幻想

第三个問題是，赫魯曉夫根据“美苏合作”的前景，散布这样一种毫无根据的幻想：彷彿世界上已經實現了和平共处，而且彷彿在帝国主义象目前这样繼續存在的情况下，也能够实现“沒有战争的世界”，企图以此使得反对美帝国主义戰爭政策的人民丧失警惕性。

首先讓我們看看赫魯曉夫是怎样估計世界現状的吧。赫魯曉夫一九六〇年九月在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議上談到和平共处的意义时說：

“显然，接受和平共处原則，并不意味着需要完全重新开始建立国际关系。实际上，和平共处已經成为現實，并在国际上得到了

承认。……現在問題的实质在于，如何使和平共处变得可靠，如何不容許背离和平共处，因为这种背离行为往往产生危险的国际冲突。”（《爭取实现沒有战争和压迫的世界》）

但是，如果正視今天的世界形势，难道能够說什么和平共处“已經成为現實，并在国际上得到了承认”嗎？难道赫魯曉夫沒有看到美帝国主义确确实实正在老撾、越南南方和刚果等地繼續进行侵略战争，拒絕承认中国、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正在世界各地加紧推行核备战和核訛詐政策这样一些危险的事实嗎？明明看到这种世界形势，却宣传什么和平共处不是今后全世界人民應該通过斗争来爭取的目标，而是已經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的現實，而且竟然說什么剩下的問題只是进一步巩固和平共处和設法防止“背离和平共处”和偶然性战争。說这种話的人只能是彻头彻尾的苏联中心主义者——这种人认为只要美苏之間保持和平，世界就是和平的，如果美帝国主义实行一定的“对苏和好”政策，就立刻认为美国統治阶级接受了和平共处政策——，只能是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投降主义者。在赫魯曉夫看来，美帝国主义針對苏联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侵略战争的准备活动和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行的軍事侵略等等，同世界和平大局无关，只不过是暂时地和部分地“背离”和平共处而已。但是，很明显，从这种狭隘的“苏联中心主义”的观点出发而无视美帝国主义目前推行的侵略政策，最后必将导致威胁苏联本身的和平与安全的结果。

赫魯曉夫既然认为目前的形势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經实现了“和平共处”，那末，他对未来形势的前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是不足为奇的。

赫魯曉夫閉眼不看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更加

肆无忌憚地发展了他的“和平共处”論，說什么在今天的世界形勢下，已經存在着从社会生活中排除一切战争的現實可能性。他說：

“我們說，在我們的时代里，已經出現了最后地、永远地把战争从社会生活中排除出去的現實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新的国际力量对比产生的。”（一九六〇年二月在印度尼西亚的加渣瑪达國立大学发表的演說）

那末，怎样才能从社会生活中“最后地永远地排除”一切战争呢？赫魯曉夫的回答很簡單。他說，通过执行他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的“全面彻底裁軍計劃”的办法，即通过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彼此都廢除軍备，从地球上消灭一切武器的办法，就能够实现。他說：

“保障和平的根本办法是彻底銷毀战争的物质手段。”“全面彻底裁軍的實現将成为人类生活中从战争时代轉向世界持久和平时代的真正历史性的轉折点。”“当然不能期待軍国主义者自动裁軍。……但是現在世界上存在着能够迫使軍国主义者裁軍的力量。”（一九六二年七月在“爭取普遍裁軍与和平世界大会”上的讲话）

就是說，不仅是在打倒帝国主义以前，甚至在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繼續存在的形势下，也能够通过世界人民的和平斗争来施加压力，解除帝国主义者的武装，夺取他們用来进行战争和压迫人民的一切暴力机器，实现“沒有战争的世界”，进入持久和平的时代。赫魯曉夫的这种“展望”，第一，陷于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即“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侵略战争的土壤”（《莫斯科声明》）这一观点不相容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观点；第二，无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根本理论，即“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問題”（列宁

語)，而散布这样一种小資产阶级的幻想：掌握着政权的帝国主义者会对人民的压力让步，并放弃統治本国人民和把其他民族置于从属地位的决定性武器——名副其实地构成国家权力基础的暴力机器。

当然，在今天这种形势下，和平力量針對帝国主义者的扩充核軍备政策提出普遍裁軍的方針并为此而斗争，这对揭露和孤立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來說，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并且在社会主义陣營和各国人民的反帝和平斗争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如下的可能性，即：挫敗帝国主义者的扩軍备战計劃、爭取建立无核武器区、簽訂禁止核武器协定以及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普遍裁軍协定。但是，彻底废除軍备、从社会生活中排除一切战争、保障持久和平的現實可能性，只有在最后打倒帝国主义、确保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过程中才能出現。放弃这种原則性的观点，幻想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情况下废除軍备、实现持久和平，那就必然会变成下述这样一种彻头彻尾地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論調：梦想帝国主义國家在保持着垄断資本主义經濟基础的情况下，会“最后地永远地”放弃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以及統治本国人民和其他民族的物质手段，“进化”为“和平的”資本主义。

在为帝国主义辩护这一点來說，赫魯曉夫不仅曾經幻想帝国主义通过废除軍备而“进化”为“和平的”資本主义，而且还描绘出这样一种牧歌式的前景：帝国主义将会改邪归正、轉变成为不再推行殖民主义政策而用自己的一部分財富来帮助不发达国家实现經濟上的发展和独立的“非侵略性的”資本主义。就是說，如果实现了“美苏合作”，社会主义國家和帝国主义國家就能实行合作，援助不发达国家发展經濟和实现工业化，引导这些国家走上經濟独立的道路。例如，赫魯曉夫在一九五九年訪問美國的时候，曾經強調

美苏两国的經濟合作在“援助不发达国家”方面所具有的意义。他說：

“我們和你們的經濟成就將受到全世界的歡迎，整個世界都在期待我們兩個大國去幫助那些在經濟發展方面落後了世紀的人民更迅速地站起來。……究竟怎樣幫助這些國家擺脫它們目前的處境，讓我們採取更好的、公正而人道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吧！”（《在紐約經濟俱樂部的講話》）

赫魯曉夫把社會主義國家和帝國主義國家聯合援助不發達國家的設想同廢除軍備的計劃聯繫起來，宣傳只有廢除軍備才是從根本上解決所謂“南北問題”的最好辦法。他說：

“蘇聯準備根據簽訂的裁軍和削減軍事預算的國際協定，同其他國家一道利用蘇聯和其他各國節省下來的資金的一部分，對所謂不發達國家進行經濟援助。”（一九五九年九月在第十四屆聯合國大會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如果廢除了軍備，將會創造出必要的條件來大大擴大對年輕的民族國家進行援助的規模。目前全世界軍費總額為一千二億美元，如果從中僅撥出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用于這個目的，那末，在二十年內就可以消滅世界上貧困地區的饑餓、疾病和文盲狀態。”（在“爭取普遍裁軍與和平世界大會”上的講話）

如果認為說這番話是為了譴責和揭露各个帝國主義國家對不發達國家的幾億人民的饑餓和貧困置之不理，而把巨額軍費耗費在备战方面的新老殖民主義政策和扩充核軍備政策，那就大錯特錯了。相反，赫魯曉夫在這兒“一本正經地”說：如果走上以“美蘇合作”為主要內容的赫魯曉夫式“和平共處”的道路，廢除了軍備，那末，社會主義國家和帝國主義國家就能共同援助“不發達國家”。事實上，在去年十二月舉行的聯合國財經委員會會議上，蘇

联代表竟然同“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美帝国主义的代表联合提出“关于和平利用全面裁军节省下来的資金的联合提案”，竭力宣传赫魯曉夫关于美苏联合、由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合作解决“南北問題”的計劃。

把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問題單純地归結为由先进国家提供經濟援助的款額問題，宣传把裁軍节省下来的軍費作为“共同援助”不发达国家的資金来源这种想法，是完全抹煞了这样一个事实：帝国主义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是企图“用新的方法和新的方式保持对原殖民地的人民的殖民主义剥削”（《莫斯科声明》）的新殖民主义的手段。实际上，即使实现了裁軍，取得了有利于和平的重要进展，从而使美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增加了能够用于“援助不发达国家”的資金，但是从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來說，那也只会直接有助于新殖民主义加强經濟和政治的統治，仅仅依靠这种做法是无助于不发达国家的經濟独立的。即使“援助”是通过联合国等机构同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实行的，单单这一点也并不能改变事情的本质，这只要看看派遣联合国軍到刚果去的情况，也就明白了。这支联合国軍是根据包括苏联在内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決議派遣的。但是，联合国这个“正式”的权威和苏联的“共同”行动，也都沒有能够阻止联合国軍成为美国新殖民主义的工具。然而，赫魯曉夫却根本不看帝国主义“援助不发达国家”的做法本身所具有的侵略性质，也不談消灭新殖民主义的斗争，却宣传什么通过裁軍节省資金，不論由哪个国家提供“援助”，只要投入必要的資金，不发达国家就可以消灭貧困，实现經濟独立。归根結底，这只能是为帝国主义者的殖民主义进行辩护，使广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人民脱离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爭取真正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革命道路，走上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妥协的

道路。

至此，任何人都会看清楚，赫魯曉夫的“和平共处”論在本质上是为帝国主义进行辩护的論調。他所提出的什么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情况下实行废除軍备和通过同帝国主义合作来援助不发达国家的这些主张，归根結底，是以这样一种彻头彻尾的現代帝国主义“本性改变”論为前提的，即：在即将到来的“和平共处”的新世界里，帝国主义将会最后地放弃战争政策，脫胎換骨地变成为同新老殖民主义毫不相干的和平的、非帝国主义的資本主义，而且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正在发生这种变化。然而，同他那种福音式的說教恰好相反，这些主张正是企图鎮压民族解放运动的論調。

（五）彻底清算赫魯曉夫路綫

上面所談到的就是赫魯曉夫的“和平共处”路綫的主要內容。归根到底，这条路綫可以概括为达样一句話：要把追随美国作为当代的首要任务，付出一切牺牲，执行追随美帝国主义的政策，“同和平的敌人联合起来，确保和平”。正如我們就它的每一个特点进行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这是一条同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應該坚持的和平共处政策毫无任何共同之处的、对美帝国主义实行合作和投降的路綫。而且，赫魯曉夫根据这条路綫，为了换取美帝国主义的信任，以便实现“美苏合作”，在执行他的对外政策时，不断地采取反人民的行动，牺牲社会主义阵营的團結，压制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爭取和平的斗争和爭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特別是从“古巴危机”以后，經過簽訂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而暂时实现了“美苏合作”体系这样一个推行他的“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

整个过程，說明了上述事實。

赫魯曉夫及其追隨者們，在“古巴危機”以後，開始更加熱心地執行追隨美國的外交方針。與此同時，比過去更加露骨地開始強迫世界和平運動和國際民主運動支持各種美化美帝國主義的論調和追隨美國的外交方針。尤其不能容許的是，在美帝國主義把亞洲作為它推行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的一個主要戰場、把“遏制中國”政策作為“世界戰略”的基礎的形勢下——這是誰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他們越來越緊密地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全面“反華政策”。赫魯曉夫及其追隨者們，在以前就借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意見分歧，無理地惡化了中蘇兩國間的國家關係。而在這一期，他們進一步緊密地推行他們的“反華政策”，同美英兩國簽訂了以阻撓中國擁有核武器為主要目的之一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並且向在同美國事實上結成軍事同盟的情況下對中國反復進行着軍事挑撥的印度提供了大量的軍事援助。他們就這樣地竟然從背後配合美帝國主義的“遏制中國”政策，直接和間接地幫助美帝國主義。而且，他們不想積極地支持正在為反對美國軍事侵略、爭取民族獨立而鬥爭的越南、老撾人民的鬥爭，而不顧人民的要求一再採取同帝國主義妥協的態度。赫魯曉夫等人的這種行動，是違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破壞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以及同民族解放運動的團結的。不過，毫無疑問，他們的主要的動機之一，就是要換取美帝國主義的領導人的信任，鞏固“美蘇合作”的政治基礎。

那末，赫魯曉夫的這種“和平共處”路線，給世界帶來了什麼呢？甚至犧牲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也在所不惜地推進同美帝國主義合作的政策的結果，是否使國際形勢朝着和平的方向多少改善了一些呢？

關於這一點，首先讓我們看一看赫魯曉夫本人的估計。赫魯

曉夫在今年七月和八月，總結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簽字后一年來的世界形勢的發展時，頌揚他的“和平共處”路線已經建立起包括美蘇在內的各國之間的互相“信任”。並且強調說，正如削減軍事預算、縮減核裂變物質的生產等等事例所表明的那樣，這種“信任”現在已經增強到了這樣的程度：能够以即使不簽訂正式協定也主動地互相作出“榜樣”的方式，也能够推進和平政策（“互為榜樣的政策”）。而且，他還極力主張，珍惜這種“信任”，并加以擴大，就能够在逐漸改善國際形勢，保持和加強世界和平。

“這個條約的簽訂使國與國關係中的信任有所增加，為未來開辟了更加良好的前景，對於促進逐漸改善國際局勢的‘互為榜樣的政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當然，為了緩和緊張局勢的共同利益，對這種正在產生的相互之間的信任必須合理地加以利用。使之有利於緊張局勢的緩和，必須珍惜和加強這種信任。”（一九六四年七月六日赫魯曉夫《對意大利和平委員會信件的回信》，黑體是引用者用的）

“我認為，簽訂莫斯科條約後一年來，在國際生活中獲得了新的經驗，這個經驗就是：如果積蓄某些信任，就能夠朝着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和在各方面達成協議繼續前進；而且不僅可以通過締結正式協定，還可以在‘互為榜樣的政策’的基礎上這樣做。因此，特別重要的是保障這種信任的積蓄，不讓它耗盡，而是相反，要千方百計地鞏固和擴大它。”（一九六四年八月三日赫魯曉夫《在莫斯科條約簽訂一周年答〈真理報〉和〈消息報〉編輯部問》，黑體是引用者用的）

按照赫魯曉夫的說法，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開辟了各國之間的“互相信任”的時代，社會主義國家

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赫魯曉夫得以大大地接近他所希望的“美蘇合作”体制，同美帝国主义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关系”。而且，在簽訂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以后，由于采取了建立美苏直通“热线”、美国向苏联輸出小麦、削減一些軍事預算、禁止把运載核武器裝置射入軌道、縮小核武器所需裂变物质的生产等等措施，逐步建立了美苏领导人之間的“信任”，至少是逐步建立了赫魯曉夫对美国领导人的信任，这是事实。但是，問題的核心不在于美苏领导人之間是否存在“互相信任”，而在于美苏领导人之間的这种“互相信任”究竟对保持和加强整个世界的和平是不是有所貢献。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簽訂以后，世界形势的实际发展情况，对这个問題作了完全否定的回答。

第一，在美苏领导人“互相信任”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絲毫沒有放松推行核备战政策和侵略政策。美帝国主义繼續执行核扩軍計劃，并且在全世界各地派駐裝載“北极星”导弹的核潛艇。在欧洲，赫魯曉夫认为柏林問題和德国問題是世界和平的根本問題，竭尽全力想要解决这个問題，并且，每年都說“今年要解决”，但是沒有任何进展，相反，通过推行多邊核力量計劃来實現西德核武装的計劃却被推进了。特别是在亚洲，美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进行以中国为主要攻击目标之一的侵略战争的准备活动，这就是：扩大了对老撾、越南南方、柬埔寨的軍事侵略，变日本本土和冲绳为核攻击基地，把印度拉进軍事同盟，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印度洋，根据在南朝鲜、冲绳、台湾发生核战争的假想举行大規模軍事演习等等。今年八月甚至公然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野蛮地进行了軍事攻击。在这里必須予以重視的是，由于簽訂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而形成的赫魯曉夫和肯尼迪以及約翰逊之間的“互相信任”，不但沒有能够遏制美帝国主义把亚洲当作当前主要戰場之一的侵略政策，反而

起了鼓励和助长它的作用。《紐約時報》記者賴斯頓在赫魯曉夫被解除职务的消息公布的那一天，写了如下的一段話，突出地表明了美苏之間的“互相信任”的政治本质。他写道：“約翰遜總統一直在說，不論美國在越南、古巴、剛果、法國方面有多少問題，只要有赫魯曉夫在，至少也能够使美苏关系比較穩定。这个看法是正确的。”（据《朝日新聞》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七日报道）就是說，所謂美苏之間的“互相信任”，是在这样的彼此“信任”的基础上成立的：苏联“信任”美国政府不对苏联立即发动核战争，美国政府“信任”苏联不对苏联以外地区的“糾紛”进行軍事干涉。因此，在赫魯曉夫領導苏联、而且美苏之間存在着“互相信任”的期間，美国可以不必害怕同苏联发生全面冲突，而放心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加紧采取侵略行动。很明显，这种“互相信任”，是一种非但不能使世界接近于和平共处，反而使美帝国主义越来越狂妄地推行侵略政策，进一步增加包括核战争在内的战争危险的“危险的关系”。

第二，美苏之間的“互相信任”，是牺牲社会主义陣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牺牲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爭取和平的力量的团结而建立起来的。赫魯曉夫为了确实取得美帝国主义的“信任”，在事实上破坏了苏联同被美帝国主义当做推行它的“各个击破”政策的当前主要攻击目标的亚洲社会主义国家間的合作关系，阻撓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爭取和平的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攻击那些坚持同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立場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越来越扩大了社会主义陣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团结。但是，莫斯科声明明确地指出，唯一能够制止企图发动世界战争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阴谋、維护世界和平的力量，是“社会主义陣營、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共同努力，是

結成反对帝国主义、爭取和平的国际統一战綫。赫魯曉夫的“和平共处”路綫，由于背叛和破坏了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反帝和平力量的团结，从而造成了有利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相应地推迟了实现真正的和平共处的结果。

目前，尽管在反帝和平力量方面存在着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团结这样一种非常困难的情况，但是美帝国主义侵略亚洲的政策面临着站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斗争前列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亚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壮大、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对立的尖銳化等等情况，正在从根本上发生动摇。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老撾、南朝鮮接连遭到失败，同时，由于中法建交、中国核試驗成功、亚非各国在反帝斗争中加强了团结、印度推行“反华”政策陷于孤立状态等等情况，美帝国主义作为“世界战略”基础的“遏制中国”政策也接连遭到打击，从而宣告了这一政策的破产。这一切事实最雄辯地表明：尽管美帝国主义推行“两手政策”和赫魯曉夫对它实行无原則的让步，但是，从总的情况來說，国际形势正向着不利于帝国主义方面而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而且，显而易見，如果赫魯曉夫的“追随美国”路綫被彻底清算，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以及全世界反帝和平力量的团结得到恢复，各国人民爭取独立与和平的力量正确地集中于打击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那末，毫无疑问，爭取世界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功，世界形势的发展也将对爭取和平、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更加有利得多。

从結論來說，赫魯曉夫領头推行的“和平共处”政策，給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和侵略势力帮了忙，同时打击了以社会主义阵营为首的反帝和平力量，在这双重的意义上說，給爭取世界和平与

和平共处的斗争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困难。而且，这个政策是由在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的苏联居于党和政府领导地位的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们长时期以来所推行的，而且，他们利用在列宁领导下第一个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苏联在国际上的威信，一直企图强迫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接受这个政策。因此，赫鲁晓夫所推行的“和平共处”政策给世界反帝和平力量造成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美帝国主义和世界反动势力对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一事表示惋惜，并衷心地呼吁苏联共产党今后仍然继续执行赫鲁晓夫路线，应该说这是很自然的。

这个事实表明，从保卫和平，使世界免受帝国主义的核战争的威胁，并且击败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正确的和平共处的观点来看，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克服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和向美帝国主义投降的现代修正主义路线，恢复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的团结的任务，也是最紧急的任务。

我们党以及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已经坚决地展开了反对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的发展过程中，现代修正主义国际潮流的最大堡垒、推行追随美国的“美苏合作”路线的主要人物赫鲁晓夫被解除了职务了，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现代修正主义潮流的矛盾和破产的表现。而且，已经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争取战胜现代修正主义和恢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的斗争造成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但是，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所犯的对外政策上的错误，不能单纯地归结为赫鲁晓夫独断独行和他个人暂时地背离了基本上正确的路线的

表現，根本問題在於，企圖通過追隨美國的辦法來確保世界和平這樣一種赫魯曉夫式的“和平共處”路線本身从根本上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的和平共處政策。既然如此，則克服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路線的任務，顯然不是單純由於解除赫魯曉夫的職務而能加以解決的。

為了從根本上解決這個任務，必須按照（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將向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提出的“報告草案”所闡明的原則性方針，進一步始終如一地系統地加強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這就是：第一，應當從思想上和理論上，對追隨美國和美化帝國主義的“和平共處”論以及現代修正主義的其他一切表現進行原則性的不調和的鬥爭。第二，應當在國際民主運動方面，按照各種不同的運動的性質，根據廣大群眾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政策的迫切要求，竭盡全力發展統一行動，並且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也應當根據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所規定的對美帝國主義的一致看法，為促進當前各國兄弟黨的統一行動而奮鬥，並在這個過程中具體地揭露現代修正主義所執行的投降帝國主義和實行分裂的路線。第三，堅決同現代修正主義國際潮流和盲目追隨它的我國各種反黨修正主義者對我們黨進行的破壞活動和搗亂活動進行鬥爭，並且予以粉碎。我們只有堅持這種原則性的態度和方針，繼續發展和加強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才能把赫魯曉夫下台這件事變成有助於粉碎現代修正主義的無原則的“和平共處”路線，恢復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贏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的更為積極的因素。而且，這才是加強全世界反帝和平力量的團結，全面地發展社會主義國家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對帝國主義、爭取和平與獨立的鬥爭，從而對確保世界和平和實現和平共處作出積極貢獻的道路。